

## 1920年代梁啟超往來南北 的政治實踐

丘文豪

### 摘 要

梁啟超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相當熱門的研究對象，然而研究成果多半集中在1918年以前。對於梁氏自北洋政壇退隱、歐遊返國後的情況，論者通常將該時期列為梁氏生涯的最後一段，並視作梁氏由政治過渡到學術的人生第二階段。在前人發現梁氏其實還有政治想望的基礎上，本文首先說明梁氏逝世後留下的「不問政治」形象，與其本人對於「政治」的新體悟間的矛盾，證明梁氏主觀上仍是「不忘政治」。接著，在前人點出梁氏欲往南方擴展勢力，以及聯絡人才的企圖上，本文進一步說明梁氏與江蘇省教育會的接觸，以及梁氏於東南大學的實際情形。梁氏因背景與理念上的親近，首先以江蘇省教育會為合作對象，卻遭受江蘇省教育會與「學衡派——國民黨」的權力鬥爭的牽連，加上被視為「整理國故」一派，遂使梁氏往南方的行動以失敗收場。梁氏結束東南大學的講學後，最終還是放棄了在南方言論界、教育界的活動，回到較為熟悉的北方京津地區。梁氏與北洋故舊維持著一定的聯繫，並始終是北洋政府的官職考慮人選，在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上，梁氏與北洋政府展現最明顯的交集。雖然梁氏主長北大一事並沒有落實，但從這「沒有發生」的事中，可以發現梁氏主觀上的積極態度及與北洋政府的密切關係。

關鍵字：梁啟超、江蘇省教育會、學衡派、北洋政府

# Liang Qi Chao's Political Practi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in 1920s

Wen-Hao Chiu\*

## Abstract

Liang Qi Chao (梁啟超) is a popular research subjec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as most works on him centered around into his life before 1918, on the so-called his earl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period, includ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time when he was in the office of the Beiyang (北洋) government, the present article stresses his life after the 1920s, including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his return from Europe, the period which scholars have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second or last episode of his career, when he transformed himself from being mainly a politician to that more purely of a scholar. Based on the studies that have unveiled Liang's persisting aspirations for politics even before the 1920s,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contradictory image left after Liang's death that he had been "non-political" before the 1920s, and his new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in order to prove that Liang in fact subjectively "did not ever forget about politics" throughout his life. Secondly, based on the studies showing that Liang went to Southern China seeking cooperation with local intellectual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Liang's contact with the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江蘇省教育會) and his teaching at Dongnan University (東南大學). Although Liang cooperated well with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n account of their sharing similar ideas and values, he however got involved in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Xueheng School (學衡派) of the KMT. Even worse to Liang was that he was seen 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restoration." As a result, Liang's Southern activities ended up in failure. After having given up his

---

\* 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ctivities and returning to Northern China, Liang still kept contact with the Beiyang government and remained its primary candidate for major positions, such as the Chancellor of Peking University. Even though he did not realize his chancellorship eventually, it is reasonable to suggest from this “never had happened” matter that Liang’s active attitude to politics was clear and hi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Beiyang government beyond doubt.

**Keywords: Liang Qi Chao,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Xueheng School, Beiyang government**



# 1920年代梁啟超往來南北 的政治實踐\*

丘文豪\*\*

## 壹、前言

梁啟超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相當熱門的研究對象，特別是在1980年代以降學界反省「革命典範」後，<sup>1</sup> 做為「調適典範」代表的梁啟超相關研究，更是層出不窮。其成果多半集中在1918年以前，也就是早年思想形成期、戊戌變法時期、辛亥革命時期、任職北洋政府時期。對於梁氏自北洋政壇退隱，歐遊返國後，也就是1920年代的情況，論者通常將該時期列為梁氏生涯的最後一段，並視作梁氏由政治過渡到學術的人生第二階段。如李文遜（R. Levenson）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三編便將1912-1929年視為梁氏從政治到學術的過程，李氏認為尤其是最後10年，梁啟超的活動集中於大學與知識界，雖然很大程度上失去年輕的熱情，但學術成果驚人。<sup>2</sup> 狹間直樹稱此時梁氏：「退出政界，奮筆耕耘，勤

---

\* 本文為本人碩士論文其中一章之改寫，撰寫過程中承蒙黃克武老師、潘光哲老師、林志宏老師，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寶貴意見，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13年7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11月27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sup>1</sup> 關於「革命典範」到「調適典範」的轉變，以及與梁啟超研究的關係，可參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頁11-14。

<sup>2</sup>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90-191.

研教育，可稱為『文化活動時期』。」<sup>3</sup> 劉紀曜認為梁氏所謂的「晚年」：「自民國九年春，經過一整年的歐遊之後回到國內，梁啟超過的是講學與著述的生涯。」<sup>4</sup> 李喜所更直言：「梁啟超的一生明顯分為政治和學術兩個層面。」<sup>5</sup> 從此可見，研究者往往以「學者」的身分對1920年代的梁啟超進行闡釋。這當中當然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如梁氏自北洋官場下野後不再任有官職；且這10年內，梁氏發表了諸多身為學術人的代表作，同時政治上並無作為。正如張朋園所言：「（梁氏）言思想，則清朝的部分，多以政治思想為重要；民國的部分，以學術方面為重要。」<sup>6</sup> 無怪乎梁氏晚年會得到「學者」的評價，且研究也多為學術思想的考察。

然而，張朋園在為梁啟超的一生分期時，注意到1920年代梁氏還有「治學而不忘政治：包括晚年的言論活動」<sup>7</sup> 一段。在實際研究上，張氏指出梁氏與過去政壇人物的交往及「協同作戰」的策略，並積極於南北大學找尋重新組建政黨的基地。<sup>8</sup> 在此基礎上，本文欲進一步探討梁氏在1920年代的政治活動是如何進行？與過去北洋人脈的關係如何？最後，在結論中略為說明梁氏何以以「學者」形象留在後世的記憶之中。

---

<sup>3</sup> 狹間直樹編，〈日文版序〉，《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4。

<sup>4</sup> 劉紀曜，〈梁啟超與儒家傳統〉（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85年），頁272-273。

<sup>5</sup> 李喜所，〈前言〉，收入李喜所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

<sup>6</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長春：吉林出版公司，2007年〔1964年原刊〕），頁4。

<sup>7</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5。

<sup>8</sup> 詳參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第六章〈新文化運動——梁啟超退出政壇後的動向〉；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合與排拒〉，《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1986年），頁81-108。此外，夏曉虹、蔣廣學、彭鵬等也分別從不同角度注意到梁氏在1920年代仍有一定的活動與政治理想。夏曉虹，〈作為政治家的梁啟超——「梁啟超」研究導論之一〉，《雲夢學刊》，第29卷第5期（2008年9月），頁5-10；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終結》（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1920年前後為中心》（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

## 貳、梁啟超的「政治」新體悟

梁啟超於1929年1月19日逝世，21日《大公報》刊了〈悼梁卓如先生〉一文，內容提到梁氏的政治貢獻部分有戊戌之役、成立進步黨、助袁反袁、主張對德參戰、討平復辟及入段內閣，而後「七年，為徐樹錚等所排擠，自是下野未再問政，七八年來，並政論亦不發表矣。……極近年革命潮盛，梁氏已為政治圈外之人。」<sup>9</sup> 接著《良友畫報》也稱梁氏為「年來專心學術」的「國學家」，政治生命也僅談到其任財政總長為止；<sup>10</sup> 地理距離更遙遠的《美國歷史評論》對梁氏的印象則更為模糊，將梁氏政治生命的斷點提前到民國成立以後，認為梁氏「民國建立後，他全心致力於歷史科學的教學、講授、寫作。他的政治活動僅限於發起組織進步黨以及後來的研究系……」。<sup>11</sup>

報紙之外，時人的回憶論述方式也與報刊報導的策略類似。伍憲子為梁啟超寫的行狀稱：「戊午冬出遊歐洲一年，庚申春歸國。自是主講清華、南開、東南諸校，專事著述，罕復談政治。」<sup>12</sup> 徐彬稱：「民八以後，梁伏處津門，於政治已趨消極，閉戶讀書……。」<sup>13</sup> 錦江說：「先生中年以後，拋棄實際政治生活。而努力於文化事業。正先生識見有超人處也。」<sup>14</sup> 鄭師許則語帶惋惜地寫道：

梁先生長逝了！正在放棄政治生活，努力從事學術的梁任公先生，……  
梁先生親自遊歐考察，返國後，思想遂大改變，決心放棄政治生活，從  
事學問，即其所著書，也著實對於學術界有益的。<sup>15</sup>

<sup>9</sup> 〈社評：悼梁卓如先生〉，《大公報》，天津，1929年1月21日，版2。

<sup>10</sup> 〈最近逝世之國學家〉，《良友》，第33期（1928年12月），頁33。

<sup>11</sup> “Historical New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4:3 (1929.4), pp. 670-671. 中譯文據梁思莊譯，收入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779。

<sup>12</sup> 伍庄（伍憲子），〈梁啟超行狀〉（原刊於《梁新會》，中國憲政黨駐美國總支部印送，1929年），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4。

<sup>13</sup> 彬彬（徐彬），〈梁啟超〉（原刊於《時報》，1929年1月26-29日），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16。

<sup>14</sup> 錦江，〈我所見之梁任公先生（下）〉，《申報》，上海，1929年2月16日，版21。

<sup>15</sup> 鄭師許，〈我國學者與政治生活——為哀悼梁任公先生而作〉（原刊於《新聞報》，1929

至於國民黨政府於1942年10月3日褒揚梁氏的理由，也是因其「有功於學術」。隨後頒布的褒揚令內容更值得玩味，故全文謄錄於下：

新會梁啟超，才思卓越，學識閎通。當清季晦塞之秋，為歐美新知之介，殫精著述，鼓舞羣倫，以恢張蹕力為心，以振弊起衰為務。士習煥變，風會聿新。洎乎晚歲，講學舊都，整理國故，旁搜遠紹，抉隱闡幽，於中華固有之文明，力加發揚，於後生活學之要旨，多所啟示，蔚成一家之言，濟以經世之教，用力彌勤，垂老不倦。綜其生平成就，實於近代學術文化有私偉之貢獻。乃志業未竟，而中道溘逝。追維賢哲，良切眷懷，用特明令褒揚，以示國家崇獎學術激勵師儒之至意。此令。<sup>16</sup>

從褒揚令中可見，梁氏於清末之貢獻，只剩下引介西學，鼓舞士風，僅為一「思想家」；而晚年整理國故，發揚中華文化，僅為一「學者」。其他大家耳熟能詳的戊戌變法、護國軍之役、北洋政府財政、司法部長，均不見於此令。

在報刊、時人與國民黨的論述中，可謂將梁氏的政治作為於其一生抽乾。然而，就梁氏自己的認知來說，果真「他的七年來的政治生涯便真的告了一個終結。自此以後，他便永不曾再度實際上的政治生活……」<sup>17</sup>了嗎？

早在1916年下野時，梁氏在〈與報館記者談話〉中即對「政治」一詞的涵義提出說明，梁氏說道：

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驟然完全脫離，原屬不可能之事，但立憲國之政治事業，原不限於政府當局，在野之政治家亦萬不可少，對於政府之施政或為相當之應援補助，或為相當之監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責任也。鄙人嘗持人才經濟之說，謂凡人欲自效於國或社會，最宜用其所長，鄙人自問若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長，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國中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實無庸為諱，非極從社會教育上痛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

---

年2月17-18日)，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94-97。

<sup>16</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4360。

<sup>17</sup> 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小說月報》，第20卷第2號（1929年2月），頁342。



立，……鄙人數年來受政界空氣之刺激越深，感此著之必要亦越切。<sup>18</sup>

「下野」並不意指從此結束「政治」生涯，對梁氏而言，在野之補救、監督政府，從社會教育上建立憲政基礎也是「政治」活動的一環。而後，梁氏在1918年又說道：

吾自覺欲效忠於國家社會，毋寧以全力盡瘁於著述，為能盡吾天職，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願略酬，決不更為政治活動，……至於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極主義，今中止政治生涯，將從別方面有所積極耳。謂不作政治活動，即為消極，吾所不承。<sup>19</sup>

雖然這時還能見到梁氏將「政治」與「著述」相對立的說法，但其中梁氏已特別說明要放棄的是「政治活動」，而這放棄並不意味著消極。從此可見，1920年代的梁啟超，並不只是個「學者」，其活動也不只是「學術研究」。

### 參、梁氏與南方勢力的接觸——江蘇省教育會

若說直隸為北方的政治中心，江蘇就是南方的政治、經濟重鎮；若能加以控制，必能闖出一番事業。張朋園雖然已經提到梁啟超南下於教育、言論、文化事業的發揮，特別欲將東南大學作為建黨基地，<sup>20</sup> 然而張氏卻對於江蘇故有勢力隻字不提。<sup>21</sup> 此外，現今學者論及中國教育界的發展，也多集中於蔡元培與北大一校，相形之下，南方人所扮演的角色每每為人所輕忽。<sup>22</sup> 因此，提到梁的南下，不能不關心自清末已開始發展教育，其勢力已經相當穩固的江蘇省教育會。且事

<sup>18</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16年8月間，頁512。

<sup>19</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18年10月26日，頁559。

<sup>20</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54-158。

<sup>21</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58-159。

<sup>22</sup> 以五四時期蔡元培從辭職北大校長到復職所經歷的種種曲折而言，南方之江蘇教育會實在是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而為人所忽略。詳參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東海大學歷史系、中正文教基金會合辦，「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12月15-17日。

實上，梁氏的南行是與江蘇省教育會接觸在先，而後又影響其在東南大學之處境。

梁氏自歐遊歸國後，便決定要放棄官場合縱連橫式狹義的政治活動，一方面從言論界下手，<sup>23</sup> 一方面則是決議創辦實業機構，創造自己的經濟基礎。<sup>24</sup> 因此南下聯繫江蘇勢力——江蘇省教育會就成為相當合理的行動策略。

擔任江蘇省教育會正、副會長者，多有為官的經歷，從而在政府中保持一定的人脈關係，真正專職從事教育者不多，且多身兼數職，集官、商、學於一體。他們是舊仕紳向新式知識分子過渡的一代人，<sup>25</sup> 正與梁啟超的背景相似。策略上，江蘇省教育會自成立起就提倡教育救國，<sup>26</sup> 這與梁氏此時欲著手社會、文化、教育相當契合。江蘇省教育會教育救國的宗旨，使其反對罷課，反對學生只作活動、談主義鬧學潮等華而不實的行動，卻不知作人格修養的基本功夫。<sup>27</sup> 五四運動初期，教育會認為五四學生運動乃愛國舉措，對學生抱以同情心態，並對其行動加以支持與聲援。但對五四後期學生的罷課舉動，省教育會並不認同，漸漸轉向限制與控制，<sup>28</sup> 這類觀點也與梁氏對學潮抱持保守謹慎的態度頗為一致。此外，梁氏主張菁英分子形成「中等社會」，由知識分子擔負社會責任，透過宣傳與教育的方式，逐漸改造人民的思想與行為的主張；<sup>29</sup> 以及欲採取紳商階級發展實業作為中國走向現代化之道的策略，<sup>30</sup> 皆使得江蘇省教育會成為其最佳的合作對象。更重要的是，與北京不同，上海的知識分子是真正與城市社會發生聯繫的，民營報紙和出版業相當發達，是全國的傳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並與商界、金融界和工業界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背後有著經濟和社會權力的支持，<sup>31</sup> 因此梁氏

<sup>23</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0年3月25日，頁581。

<sup>24</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38。

<sup>25</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63。

<sup>26</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127。

<sup>27</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26，註1。

<sup>28</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21-222。

<sup>29</sup>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152、154。

<sup>30</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88-189。

<sup>31</sup> 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圖書公司，2007年），頁164。

相當重視往南方，特別是上海等地區的發展，因而有信問同人道：「在滬有活動餘地否？」<sup>32</sup>

江蘇省教育會之首腦張謇，雖然過去與梁啟超同屬憲友會，但其實貌合神離，關係極為平常，二人不僅沒有深厚關係，甚且頗有嫌隙。張謇是一個極端反對激烈改革的人，尤其對於革命不表贊成；在憲友會內，張謇屬於溫和的江浙派，與激烈的梁氏等政聞社出身的不同；又張氏主張向日本學習，梁氏則主張英式憲政。<sup>33</sup> 縱使二人在過去有種種矛盾，然就在梁氏回國之初，便於1920年3月12日偕張君勳、蔣百里同去拜訪張謇，且言談頗久。隔日，張謇更為主席，代表致詞歡迎梁氏一行人。而梁氏此行目的便是為了與張謇當面洽談，為此應張氏之招停留3日。<sup>34</sup> 對於這次的面談，梁氏顯然是相當滿意，隨後給女兒的信中談到了此次上海之行的心得，其中說道：「吾自歐遊後，神氣益發皇，決意在言論界有所積極主張，居北方不甚便，兩月後決南下，在上海附近住。」<sup>35</sup> 對比信中另外一句：「滬上政客未接一人，最為快事」<sup>36</sup> 的得意，足見梁氏確實是想從南方言論界開始其新的政治生命。

張謇之子張孝若曾回憶道：

我父對於梁公，認為在清季他對於濬發中國人的思想的原動力，在民國他對於推翻帝制復辟二役的功績，都於國家有極偉大的貢獻和努力。所以後來幾年，彼此愈加親近引重。在他經濟狀況最窘迫的當口，我父親還幫助他好幾回，等到民國九年梁歐遊回來，在實業上，還想和我父有一度結合。我父曾經為這件中比合辦實業的事，有一封寫給大生紗廠董事的信。<sup>37</sup>

可見在民國之後，兩人的關係已經逐漸融洽；而張氏回憶末段提到的中比合辦實

<sup>32</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1年11、12月間，頁606。

<sup>33</sup>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長春：吉林出版公司，2007年），頁96-100。

<sup>34</sup> 〈南通〉，《申報》，上海，1920年3月12日，版7。

<sup>35</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0年3月25日，頁581。

<sup>36</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0年3月25日，頁581。

<sup>37</sup> 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頁476。

業一事雖然並未成功，<sup>38</sup> 但隨後梁氏又擬邀張氏擔任講學社董事，並樂觀地認為張氏「想必樂就也」<sup>39</sup>；當《時事新報》經濟困窘時，其同人傅治及張東蓀便主張向張謇求助；<sup>40</sup> 此外，梁氏也與張氏「手下第一猛將」劉厚生在近 3、4 年有極深的關係。<sup>41</sup> 或許可以說明兩人在 1920 年初的一段交往，已經達成某些理念上的共識，梁氏與江蘇省教育會的第一次嘗試合作，至少相處上是融洽的，且有繼續合作的空間。

1922 年，梁氏應邀至東南大學講學後，更為積極的參與江蘇省教育會的活動。由於江蘇省教育會內部，張謇在民國後影響力稍有下降，黃炎培的勢力則逐漸上升，<sup>42</sup> 梁氏於 8 月 10 日初到東南大學演講時，以〈先輩與後輩〉為題演講時，內中也特別以江蘇省教育會舉例：

先輩當帶後輩行，倘至中途不能行，即當讓人行，既不行又不讓，如之何其可？名義上居指導地位，事實上不能指導，現在社會上先輩多犯此病，且多十幾年前所得之知識，如何指導得動？……如江蘇之省教育會、可謂為中國最有聲名之團體、而早年舉會長是張謇、及至現今仍是張謇、其實早應居指導地位矣、此先輩所當覺悟者也。<sup>43</sup>

此後，梁氏在南方的活動便多與江蘇省教育會其他的年輕成員接觸。

梁氏於 8 月 12 日清晨由甯到滬，並赴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於一品香所設之歡迎宴。<sup>44</sup> 8 月 14 日，梁氏又參加了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籌建校舍募金委員會，到場的江蘇教育會成員有黃炎培與袁希濤等，會中梁氏與黃氏皆有發表演說。<sup>45</sup> 8 月 23 日，梁氏與張孝若同赴狼山遊覽，並應邀演說。<sup>46</sup> 隨後，梁氏與黃炎培更同應

<sup>38</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38 註 12。

<sup>39</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0 年 9 月 5 日，頁 591。

<sup>40</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0 年 10 月 15 日，頁 592。

<sup>41</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0 年 7 月 20 日，頁 586-587。

<sup>42</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 2。

<sup>43</sup> 〈梁任公在甯之演講·題為先輩與後輩〉，《申報》，上海，1922 年 8 月 10 日，版 10。

<sup>44</sup> 〈梁啟超昨日到滬〉，《民國日報》，上海，1922 年 8 月 13 日，版 11。

<sup>45</sup> 〈美專籌建校舍歡迎委員會誌〉，《申報》，上海，1922 年 8 月 14 日，版 13；〈請看梁啟超之大演說〉，《民國日報》，上海，1922 年 8 月 14 日，版 10。

<sup>46</sup> 〈南通〉，《申報》，上海，1922 年 8 月 23 日，版 11。

武昌中華大學暑期學校之邀請，赴鄂講演；<sup>47</sup> 中途又臨時同應湖南省長趙恆惕之邀前往演講。<sup>48</sup> 此外，中華教育改進社的活動，更可以看出梁氏積極與江蘇省教育會聯繫。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主要成員蔣夢麟、黃炎培與陶知行等<sup>49</sup> 皆為江蘇省教育會的核心人物，梁氏自1922年7月3日的年會中，便與黃炎培等相繼演講；<sup>50</sup> 1922年12月17日在上海召開的大會上，梁氏不克出席，則是請陶知行代表；<sup>51</sup> 1923年12月23日，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二週年紀念會，梁氏也於其中發表演說。<sup>52</sup>

至於梁氏與江蘇省教育會在人情交往上，劉海粟可作為一個具體的例證。劉氏於1919年將前文提及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改組，並成立校董會。校董包括蔡元培、梁啟超、黃炎培、沈恩孚等，不僅擴大了上海美專的影響，更加強了美專與江蘇省教育會的聯繫，使兩者綑綁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體。<sup>53</sup> 梁氏除了為該校的校董外，劉氏回憶在「第三次模特兒事件」<sup>54</sup> 時，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對劉氏都很關心，劉氏駁斥孫傳芳的文章，也刊登於梁氏同人主辦的《時事新報》。<sup>55</sup> 另外，當上海美專經濟拮据時，梁氏也立刻關照黃群送去一張5千元的支票，支持了教學，使師生都很感激。<sup>56</sup> 從此可見，梁氏欲與江蘇省教育會聯繫的企圖十分積極。

梁氏與江蘇省教育會諸公的交往，除了是試圖向南方擴張，以建立勢力的「協同動作」策略外，其實從思想角度來看，雙方對於中國的未來與實際著手的

47 〈武漢報界歡迎梁黃紀〉，《申報》，上海，1922年9月9日，版10、11。

48 〈梁黃蒞湘講演紀〉，《申報》，上海，1922年9月7日，版10。

49 劉惠璇，〈中華教育改進社與教育獨立運動（1921-192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86年），頁101。

50 〈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記（濟南通信）〉，《申報》，上海，1922年7月6日，版10。

51 〈教育改進社董事在滬開會紀〉，《申報》，上海，1922年12月18日，版13。

52 〈紀教育改進社二週紀念會〉，《申報》，上海，1923年12月26日，版4。

53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00-201。

54 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支持下，劉海粟引進人體寫生與展覽的作為在一段時間內都相當順利的進行，但於1924年後出現轉變，孫傳芳直接下令取締模特兒，並禁止裸體寫生。詳參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01-210。

55 劉海粟，〈憶梁啟超先生〉（原刊於《齊魯談藝錄》，山東美術出版社，1985年），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49。

56 劉海粟，〈憶梁啟超先生〉，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49-250。

手段上有相當的契合。江蘇省教育會自民國建立後，為了普及教育和培養共和國民，相繼倡導建立圖書館、通俗教育館、公共體育館、通俗演講所，<sup>57</sup> 並致力於通俗教育。<sup>58</sup> 至於在職業教育方面，則強調將「學一仕」的觀念改為「學一就業」，正是一種為士到知識分子的轉變；<sup>59</sup> 透過職業教育的提倡，使教育的受眾對象從學校擴展到社會層面，學員不再侷限於書面層次的學習，更注重社會的實踐與實用技能。<sup>60</sup> 從梁氏最近講演的主題來看，如1922年7月3日於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講演之〈教育與政治〉；1922年8月14日於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講演之〈敬業與樂業〉，以及1922年9月10日於武昌的〈無業遊民〉均可見得梁氏近來思考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全民教育與職業教育方面，正與江蘇省教育會無論在目標與手段上皆有合作的思想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梁氏欲借重江蘇省教育會的理想是如此積極，但從黃炎培的態度看來，雙方的合作其實是有限度的，<sup>61</sup> 然這限度卻不能掩蓋梁氏主觀欲聯繫的企圖，以及在外人眼中雙方的親近。

## 肆、梁氏與南方勢力的接觸——東南大學

前人多注意到梁氏與北大一派之差異，進而將梁氏歸類於學衡一派。<sup>62</sup> 雖然

<sup>57</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82。

<sup>58</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177-189。

<sup>59</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130-138。

<sup>60</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137-138。

<sup>61</sup> 黃炎培在1922年9月的日記中，曾記下：「至省議會，觀任公說或聞。」一語，除此之外，甚難見到黃氏在日記中提到梁氏之處，或許可說梁氏盛意拳拳，然礙於其令人存疑的政治背景與雙方當時實力上的差距，使梁氏的南方擴展之旅只能以失敗收場。詳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2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頁142。

<sup>62</sup> 如李茂民認為胡適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和梁啟超所主張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不同的。李氏認為，胡適僅停留在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上，梁啟超則認為這只是對待傳統文化的一條道路，還有更重要的一條道路，就是對於傳統文化中「德性的學問」用內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此外，梁氏反對唯科學，也與陳獨秀、胡適等不同。而董德福認為，在治史方法和治史原則方面，梁啟超和胡適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認識到研究歷史須嚴格的做到忠實、客觀。但在「整理國故」的方法上也存在著原則性的分歧，這與他們對中國文化特質的把握是分不開的；胡適的「整理國故」專從知識方面考證、梳理，而梁

如此，卻不能忽略1922年梁氏於東南大學講學時，實際上與東南大學的若干教授特別是學衡派<sup>63</sup>的相處並不融洽。除了柳詒徵在《史地學報》上刊出攻擊梁氏與胡適及章炳麟等人研究先秦諸子的缺失；<sup>64</sup>在《學衡》上對梁氏的《佛教史》提出批評；<sup>65</sup>且認為梁氏之墨子研究根本不通外，<sup>66</sup>其他的意氣之爭更值得注意。

根據當時為東南大學學生的黃伯易回憶：「有人說梁啟超這時正像孔二老頭到南方隨處碰壁引起苦悶一樣。……隨即發現『學衡派』。……也在攻擊梁啟超。」<sup>67</sup>可見除了學術觀點上的論辯外，他們的攻擊更是毫不留情面，如黃氏聽

---

啟超的「整理國故」兼及道德修養，遵循了中國傳統的「知行合一」的套數。另外江涓也注意到，梁氏反對胡適、傅斯年「國故運動」的實證主義學風，並以「為人生而學術」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的主張。沈衛威則在學衡派的研究脈絡下，認為梁啟超對東南大學舊的傾向顯然有特殊的好感。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99、200；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68-279；江涓，〈從「士君子之學」到現代「人生哲學」——論五四後梁啟超對儒學史的重構及其思想意圖〉，《淡江中文學報》，第20期（2009年6月），頁153-154；沈衛威，《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297。

<sup>63</sup> 沈松僑認為，「學衡派」是指《學衡》的作者群，因此王國維也為沈氏歸類為「學衡派」之一員。沈衛威則認為，所謂「學衡派」不只是《學衡》，而是包含了自《學衡》延續到《國風》與隨後《思想與時代》的成員，因此章太炎與朱希祖等皆包含其中。詳參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1984年），頁5、210；沈衛威，《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頁37。然筆者認為，這樣的分法似乎過於放大「學衡派」的規模與影響力，故本文所謂「學衡派」採取最為狹義的定義，僅指梅光迪、吳宓、胡先驕、柳詒徵等於東南大學任教的核心成員。另外，學衡派及東南大學內部人事其實非常複雜，本文尚無力處理這個問題，如高恆文就認為東南大學不等於學衡派，因為學衡與同在東南大學的國學研究會便不相往來。高恆文，〈學衡派與20年代的國學研究〉，收入程光燁編，《文人集團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1-51。另外可參考王信凱對於柳詒徵的相關研究：王信凱，〈柳詒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宜蘭：佛光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王信凱，〈《學衡》中的「柳詒徵」〉，《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5期（2004年），頁251-294。

<sup>64</sup>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204-205。

<sup>65</sup> 柳詒徵，〈梁氏佛教史評〉，《學衡》，第2期（1922年），頁1-10。

<sup>66</sup> 柳定生，柳曾符編，〈復李君書〉，收入柳定生等編，《柳詒徵劬堂題跋》（臺北：華正書局，1996年），頁283。

<sup>67</sup>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原刊於《文史資料選輯》，第94輯，文史資

到幾位教授私底下談道：

梁啟超寫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學者已積累了不少資料，順手拈來都可以成書，倒是小石（胡光燁）的《中國文化史》不好編；梁啟超如果繼續寫漢、魏政治思想，就會感到江郎才盡了；我敢擔保憑梁啟超這副本領，一輩子拿不出來！<sup>68</sup>

另外，顧寔<sup>69</sup>講授《古詔學》引證《道德經》的俳句時，也楞眉怒目地攻擊梁啟超：「《道德經》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啟超摸不到邊，他講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sup>70</sup>對於其他場合東南大學教授對梁氏的批評，黃氏也處處為梁啟超乾著急，如他舉例其他教授的攻擊：

例如「梁啟超只主張『尊王攘夷』」；「梁啟超毫不瞭解種族鬥爭相糾結的中原文化」；「梁啟超用他的儒家思想寫《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離客觀的學者態度」；「梁啟超治學術情感有餘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更莫衷一是」。……可惜我們當時排遣不開，而處處為梁啟超著急。<sup>71</sup>

---

料選輯出版社，1984年），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68。

<sup>68</sup>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69。

<sup>69</sup> 承蒙審查人提醒，顧寔極為推崇乾嘉考據之學，不能算是學衡派人，應該為章炳麟派。然而，這時候章炳麟對疑古風潮早有許多批評，晚年在蘇州辦國學講習所，其宗旨之一就是批判新學風。從其學生的闡述中可以得知，章氏晚年的許多言論都是針對新學者而發的，姑且不論「學衡派」的範圍與定義，當時一干反對北大新學者正如錢基博所言：「丹徒柳詒徵，……刊《學衡雜誌》，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適過重知識論之弊。一時反北大派者歸望焉。」可見東南大學的學者多是聚集在「反北大新派」的旗幟之下。他們對梁啟超的排斥，可以說梁氏努力跟上整理國故風潮的一個負面後果。詳參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總敘〉，收入錢基博著，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8；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公司，2010年），頁463。

<sup>70</sup>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69。

<sup>71</sup>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69。



在其他公開的場合中，學衡派教授們甚至當面給梁啟超難看：

轉瞬下期開學，在秋光明媚的東大花場——菊廳，成立了國學研究會。師生二、三十人借覆舟山下菊畦為背景攝完照片，公推梁先生講話。他用十分鐘作開場白後說：「為了不辜負大好秋色，我建議本『各言爾志』主義，挨次普遍發言。」哪知竟好似出了一個難題，在座的教授默不出聲，無人肯帶頭講話，梁先生終於轉變話題：「改為自由漫談吧！最好講出一件生平最感興趣的事……。」有位同學講了一段笑話，雖然博得大家一笑，究未能絲毫削弱「學衡派」對梁啟超的冷淡。<sup>72</sup>

除了背後的攻擊與相處上的冷淡外，更有直接的吵嘴：

秋節，我們在校內六朝松下的梅庵舉行第二次國學研究會，召集人在事前作了布置。開會時有教授作了專題啟發報告，討論時大家提出意見使主題內容更為豐富。因此大家感到這一次會開得極好。這時圓月初上，餘興未盡，有人轉變話題到顧憲教授早年作品《人生二百年》。立時引動梁啟超的興會，說出：「……我梁啟超一定要活到七十八歲！」立時引來了教授們的不同意見。吳梅（瞿安）說：「生死何足道！」王樸安說：「未知生，焉知死？」柳翼謀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陳佩君說：「生死事大，無餘涅槃」。……看來教授們的人生觀也是五花八門的。總覺在態度上都是反對梁的。最後陳黼玄（鐘凡）調侃的說：「我們顧先生會算八字，讓他給梁先生算算！」梁啟超剛說完：「我梁啟超生平從不迷信！」就引起顧憲大為震怒的說：「我不像梁啟超！我自己算過，我要活八十歲零一早晨，最後一早晨要與死神拼命！」連最好的一次會也不得不使人掃興了。<sup>73</sup>

從學衡派諸人對梁氏近乎「找麻煩」式的「找架吵」可以發現，梁氏與東南大學與學衡派之互動，不應該簡單地從後見之明將他們歸為同黨，<sup>74</sup> 其間的實際情

<sup>72</sup>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69。

<sup>73</sup>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69-270。

<sup>74</sup> 如李茂民說到，梁啟超對儒家學說的整體評價上，與激進主義有更大的距離，與保守主義有更多相近之處。或是更直接的將梁氏與學衡諸子直接放入「東方文化派」內。李茂民，

形，其實富含許多文章。學衡派對梁氏之冷淡與攻擊，筆者認為正可以兩種情況說明。首先，所謂「學衡派」或說聚集於東南大學的諸教授們，基本上是作為北大新文化一派的反對者而存在，<sup>75</sup> 從《學衡》與《新青年》的文學抗衡到南方以《史地學報》反對古史辨運動。<sup>76</sup> 即使在當時北大派對梁氏過去的政治背景與當下的政治企圖始終抱有戒心，<sup>77</sup> 但在很多方面，梁氏積極參與新文化活動，並試圖建立聯繫，因此理所當然在文化觀點上被視為北大新文化派的同路人。

以當時的學術風氣而言，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成為一句愈來愈流行的新口號，於是「整理國故」成了一種新人物所從事的學術新事業，<sup>78</sup> 更是1920-1930年代為中國學術文化界的一股熱潮。<sup>79</sup> 為了擴張對國故的研究與整理，1921年7月底，胡適應東南大學及南京高等師範暑假學校之邀，演講「研究國故的方法」。1923年初，胡適復應清華學校畢業生之邀擬了一份〈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sup>80</sup>

從晚清至新文化運動，對於文史研究就有「國粹」、「國學」及「國故」三

---

《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頁117-118；鄭大華，〈論「東方文化派」〉，《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1993年），頁116。

<sup>75</sup> 如錢穆所言：「民國初年以來，陳獨秀胡適之諸人，先後任教於北平北京大學，創為《新青年》雜誌，提倡新文化運動，轟傳全國。而北京大學則為新文化運動之大本營所在。民國10年間，南京中央大學諸教授起與抗衡。宿學名儒如柳翼謀，留美英俊如吳宓雨生等，相與結合，創為《學衡》雜誌，與陳胡對壘。」錢基博認為：「丹徒柳詒徵，不趨眾好，以為古人古書，不可輕疑；又得美國留學生胡先驕、梅光迪、吳宓輩以自輔，刊《學衡雜誌》，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適過重知識論之弊。一時反北大派者歸望焉。」錢穆，〈紀念張曉峰吾友〉，收入中國文化大學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編纂委員會編，《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6年），頁7；錢基博，〈《國學文選類纂》總敘〉，收入錢基博著，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頁18。

<sup>76</sup> 彭明輝，〈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初始（1911-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9期（2008年5月），頁51-84。

<sup>77</sup> 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1920年前後為中心》，頁61。

<sup>78</sup>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頁91。

<sup>79</sup>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頁407。

<sup>80</sup>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頁392-393。

種態度的演變，<sup>81</sup> 學衡派基本上是主張倡明「國粹」的；<sup>82</sup> 然而梁氏除了認同「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文獻學問外，也稱這樣的方法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並承認整理國故為當務之急；<sup>83</sup> 另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氏也使用「國故」一詞，<sup>84</sup> 便可見其立場。其後梁氏在清華研究院的學生吳其昌等人也發起實學社，辦《實學》月刊，以「發皇學術，整理國故」為宗旨；<sup>85</sup> 而梁氏也很鼓勵學生們整理國故的熱情。<sup>86</sup> 此外，早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時，這種結合清儒與近人研究諸子的成果，便獲得梁啟超的讚賞；<sup>87</sup> 此後梁氏《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創作，不能不說或許也受到胡適的「成功」例子所鼓勵。<sup>88</sup> 就在胡適應清華學校畢業生之邀的同年，梁啟超也應清華學生之請，為他們擬〈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並撰〈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對胡適所開列的書目提出批評。<sup>89</sup> 學者陳以愛便認為，胡、梁二位對年輕學子該讀哪些國學要籍雖有歧見，然其對國學研究的重視態度則一。以這兩位五四前後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袖，竟同時為青年開國學書籍要目，對「整理國故」

<sup>81</sup>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389-390。

<sup>82</sup>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202-203。

<sup>83</sup> 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1923），收入氏著，《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臺1版），第14冊，頁110。

<sup>84</sup> 梁氏說道：「國故之學，曷為直至今日乃漸復活耶？蓋由吾儕受外來學術之影響，採彼都治學方法以理吾故物。」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3版），頁13。

<sup>85</sup> 夏曉虹，〈梁啟超與吳其昌——吳其昌著《梁啟超》前言〉，收入吳其昌著，《梁啟超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3。

<sup>86</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1927年8月8日，頁742。

<sup>87</su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頁42。

<sup>88</sup> 《中國哲學史大綱》大獲好評，使胡適在白話文贏得社會上的名聲之後，又在專業的學術領域內建立了一個牢固的地位。胡適的「成功」例子，鼓勵了與他同時進入北大的劉文典，也朝這方面努力，以諸子學為研究範圍，選定《淮南子》一書，費1年多時間寫成《淮南鴻烈集解》。劉氏選擇《淮南子》一書進行考證，既順應清末民初興起諸子學興盛的潮流，也符合北大文科重視考證的學風。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頁63、66。

<sup>89</sup> 梁氏與胡氏除了在國故運動上有所唱合外，其他如清代學術、諸子學等的討論，有贊同也有辯難，可見梁氏是主動的參與胡適一派的學術議題。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合與排拒〉《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1986年6月），頁92-100。

運動的擴大，自然起了極大的推波作用。<sup>90</sup> 此外，有別於傳統派史家反對追逐新史料的風氣，主張不用新史料也可以寫史，<sup>91</sup> 如吳宓便認為甲骨文、考證金石等文章，直如糟粕，只是勉強收入《學衡》。<sup>92</sup> 梁氏則認同新史料對於歷史研究的幫助，如其認為離開事跡的考據，專從文字下手會有「甚空」的遺憾，<sup>93</sup> 進而肯定王國維在鐘鼎、龜甲上找根據的科學精神。<sup>94</sup> 從此可見，梁啟超基本上是同意「整理國故」這一風潮的，尤有甚者，梁啟超甚至自認要為國故運動的興起負責。正如彭春凌所言：「梁啟超與胡適爭相為提倡史料、整理國故承擔責任，這有『難』同當的背後，也是『爭勝』，也有相當驕傲的心情。」<sup>95</sup>

梁氏緊跟著新文化及「國故運動」的風氣，時人當然也看在眼裡。1924年《申報》一篇呼籲青年關心中國現況的文章便說道：

許多很好學，很有志的青年跟着梁任公、胡適之做整理國故的事業；跟着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做創作文藝的事業。這原是很好的事，……不過大家要明白，整理國故、創作文藝都是少數有素養的人的事業。<sup>96</sup>

此外，徐彬也認為梁氏晚年著作，是以新法整理國故為多。<sup>97</sup> 至於在整體評價方面，胡適認為梁氏「頗能努力跟著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sup>98</sup> 鄭振鐸也認為梁氏「仍是一位活潑潑的足輕力健，緊跟著時代走的壯漢呢。」<sup>99</sup> 1942年國民黨給予梁氏之褒揚令中也說道：「講學

<sup>90</sup>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頁393。

<sup>91</sup>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461。

<sup>92</sup>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頁211。

<sup>93</sup> 梁啟超，〈儒家哲學〉，收入張運生、王曉洁編校，《儒家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40。

<sup>94</sup> 梁啟超，〈儒家哲學〉，收入張連生等編，《儒家哲學》，頁64。

<sup>95</sup> 彭春凌，〈《歷史研究法》與1920年代的梁啟超〉，《雲夢學刊》，第29卷第5期（2008年9月），頁22-23。

<sup>96</sup> 沈選千，〈青年快注意國內的現況〉，《申報》，上海，1924年2月27日，版18。

<sup>97</sup> 彬彬（徐彬），〈梁啟超〉（原刊於《時報》，1929年1月26-29日），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14。

<sup>98</sup> 適之（胡適），〈老章又反叛了〉，《國語周刊》，第12期（1925年8月30日），頁1。

<sup>99</sup> 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小說月報》，第20卷第2號（1929年2月），頁333。

舊都，整理國故，旁搜遠紹，抉隱闡幽，於中華固有之文明，力加發揚，於後生活學之要旨，多所啟示，蔚成一家之言」，<sup>100</sup> 同樣承認梁氏對於整理國故之貢獻。從另一方面而言，對梁氏不以為然的批評則是相當重要的反面證據，如錢基博認為，梁啟超樂於引胡適之說以自張，<sup>101</sup> 因為梁氏：「有惟恐落伍，競競焉日新又新以為追逐」。<sup>102</sup> 李肖聃也提到反對新文化運動者對梁氏的失望：

是時積溪胡適教授北京大學，力主以語體代文言，號新文化，群士方望梁歸，有以正之。而梁著《歐遊心影錄》，乃效胡體為俚語，於是士友失望。章士釗宣言於眾曰：「梁任公獻媚小生，隨風而靡。」蓋傷其不自愛重，而欲謾聞動眾也。<sup>103</sup>

無論評價是好是壞，這些評價均見梁氏努力跟上國故運動熱潮的主觀想望，已經成為眾人眼中一項客觀的事實。在反對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國故運動的學衡派眼中，梁氏自然成為眼中釘。《學衡》於1923年第18期刊登〈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內中說道：「梁飲冰自執筆已還，宗旨不知幾變。日下韜迹天津，云以著書為事，吾恐不能如前之洩聞動眾矣。時人看研究會之湯、梁，真是一錢不值也。」<sup>104</sup> 《學衡》刊登如此挑釁的言論，便是要藉此表達對新文化運動的不滿，<sup>105</sup> 更是學衡派將梁氏視為與新文化一派同為打擊對象的證據。

學衡派排擠梁氏的第二個原因則是梁氏被捲入東南大學內江蘇省教育會與學衡派——國民黨的權力鬥爭有關。從前文可知，由於在背景、思想、策略及目標上皆有相契合之處，梁氏初抵南方便選擇與江蘇省教育會進行密切的合作。然而東南大學內部並非一和諧之整體，必須注意到東南大學在發展過程中，因辦學方針也分成兩派，柳詒徵、竺可楨等主張教育獨立並接受教育部指導；而以江

<sup>100</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八）》，頁4360。

<sup>101</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頁263。

<sup>102</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節選）·四版增訂識語〉，收入錢基博著，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頁501。

<sup>103</sup> 李肖聃，《星廬筆記·梁啟超》（原刊於《星廬筆記》，岳麓書社，1983年），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38。

<sup>104</sup> 〈文錄：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續第十六期）〉，《學衡》，第18期（1923年），頁7。

<sup>105</sup> 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6期（2002年5月），頁39。

蘇省教育會成員郭秉文為首的董事會則倚重地方力量，尤其在財力上依靠軍閥官僚。<sup>106</sup> 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治校風格類似美國大學校長：聘請名師，講求實學，摒絕激進思想，在校外則親自與北京教育部門、蘇省軍政階層、省教育會等中央地方官僚仕紳聯絡折衝。實際上，郭氏與直系督軍李純、齊燮元關係良好，並從中求得許多經費。<sup>107</sup> 此外，郭秉文在1921年 8 月補行開學典禮的講壇上更說：「我一定要永遠保持住南京學生的優良傳統——埋頭用心讀書，不問政治……」，這話便得到了臺上的督軍齊燮元和省長王瑚的嘉許。<sup>108</sup>

政治主張上，江蘇省教育會提倡的「蘇人治蘇」與國民黨尋求統一的主張矛盾。1923年，鑑於曹錕賄選，教育會確信只有聯省自治才能救亡，為籌備自治人才，省教育會聯合地方仕紳建議於省長韓國鈞，共同籌建江蘇自治學院，並由張君勱擔任籌備主任。<sup>109</sup> 至於對於教育的態度，江蘇省教育會堅守教育獨立，避免學生捲入政潮，以抵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和其對學生的滲透、運動。如會長袁希濤在1926年指出「學生在求學時代亦應注意修養，求真實學問，將來方能真真救國」，<sup>110</sup> 這樣的風格自然與親近國民黨的柳詒徵、顧寔相當不合。

1923年以前，雙方還相安無事，但自從善於調和內部不同意見，且與學衡派交好的劉伯明於1923年11月病逝後，學衡派與中國科學社的元勳人物就對郭校

<sup>106</sup>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北伐統一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頁136。此外，即使在學術路術上，東南大學也不能直接等同於學衡派。陳以愛提到，東南大學教授陳中凡在北大時師事劉師培，為《國故》月刊編輯之一；但1919年以後，其治學意趣逐漸改變，至1923年出版《古書讀校法》時，因為陳氏在1921年前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便受到北大「整理國故」風氣之感染，已對「保存國粹」式的讀書態度大肆批評。故其在1923年負責主編由東南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合辦之《國學叢刊》時，即提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另外沈衛威也注意到陳中凡有意的游離在學衡派與北京大學新青年派的對立之外。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頁396；沈衛威，《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頁299。

<sup>107</sup>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北伐統一史，頁132。

<sup>108</sup> 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64。

<sup>109</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48-249。

<sup>110</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69。

長過度遷就環境，時有不滿。<sup>111</sup> 大體上親近國民黨的學衡派成了東南大學內的國民黨勢力代表，而作為南方逐漸壯大的政黨，國民黨延續了北洋政府對江蘇省教育會的壓制，於1923年便派汪精衛聯絡黃炎培，準備以教育會作掩護，開設平民學校進行地下工作時，卻遭到了婉言拒絕。<sup>112</sup> 1924年年底，在北京的國民黨人，包括楊銓和東南大學教授陳去病、柳詒徵、顧寔等，頻頻聚會，他們連同蕭純棉、胡剛復和吳稚暉、汪精衛透過了時任教育部次長而代理教育總長的國民黨人馬敘倫會商計畫，先免郭校長之職，再進一步推倒東南大學董事會。<sup>113</sup> 國民黨倒郭的根本著眼便在於打擊江蘇省教育會，削減教育會在東南大學的勢力。<sup>114</sup> 因此，正如呂芳上所言，東南學潮可以說是國民黨與「江南學閥」的明爭暗鬥。<sup>115</sup>

了解東南大學內部的紛爭後，事實上梁氏的行動其實較為接近江蘇省教育會一方。1922年8月6日東南大學舉辦暑校歡迎會，會中由郭秉文主持，歡迎梁啟超、省長韓國鈞、教育廳長蔣竹莊等名流；<sup>116</sup> 8月8日齊、韓兩長又於省署公宴梁氏。<sup>117</sup> 1923年1月14日，梁氏則在東南大學公宴齊、韓兩長以及各機關長官。<sup>118</sup> 此外，梁氏又努力接近被國、共兩黨視為江蘇學閥的郭秉文與黃炎培；在國共兩黨的眼中，這些人的政治主張與辦學理念本來又較接近研究系。<sup>119</sup> 因此，梁氏與國民黨的舊怨，與江蘇省教育會之交好，與地方軍閥的親近，加上前文所言梁氏國故運動陣營的身分，夾在作為國民黨與江蘇省教育會權力鬥爭的場域東南大學中的梁氏，其下場可想而知。

<sup>111</sup>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北伐統一史，頁132。

<sup>112</sup> 許紀霖，《黃炎培：方圓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54。

<sup>113</sup>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北伐統一史，頁136。

<sup>114</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64。

<sup>115</sup>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北伐統一史，頁150。

<sup>116</sup> 〈紀東南大學暑校歡迎會〉，《申報》，上海，1922年8月8日，版10。

<sup>117</sup> 〈南京快信〉，《申報》，上海，1922年8月9日，版10。

<sup>118</sup> 〈南京快信〉，《申報》，上海，1923年1月14日，版10。

<sup>119</sup>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頁135。

此後，青年學生由於江蘇省教育會過於保守的態度，加上國民黨第一次在中央委員會裡設置了青年部，顯現其對邊緣知識青年的重視。<sup>120</sup> 特別是在三一八事件後，教育會仍希望學生不要參與國是，這種要求學生對政治疏離的態度，使得已經運動起來的學生轉而投靠鼓動學生政治化的國民黨。<sup>121</sup> 在此之下，梁氏在南方的影響力也大受影響，如張君勱轉述黃炎培所言為《申報》作文條件為：

謂先生文字，《申報》極為歡迎，惟有兩條件：第一，不用向來名號，如飲冰室或其他先生所曾已屬之名。所以為此者，免人以著色眼鏡相視。習而久之，知其為先生作，則亦無礙矣。<sup>122</sup>

要「言論界之驕子」不以向來名號示人，如此不堪的條件，足見梁氏在逐漸激進化的邊緣知識青年心中，尤其是在其1920年初欲有所為的言論界中慢慢失去影響力。1923、24年間，梁氏的活動日益侷限於學術，這不僅是因為張朋園所言梁氏的學問興味蓋過政治目的，<sup>123</sup> 更是有如此不得已之原因。也因此，梁氏於1925年8月3日向孩子們說道：「我想我們生活根據地既在京津一帶，北戴河有所房子，每年來住幾個月……」，<sup>124</sup> 與前文提及1920年梁氏欲居住上海以便其行動的想法，正可作為其往南方言論界活動的始終。

## 伍、梁氏與北洋故舊的聯繫

梁氏結束了東南大學的講學後，最終還是逐漸放棄了在南方言論界、教育界的活動。由於與北洋官場故舊的舊情聯繫，梁氏回到了較為熟悉的北方京津地區。要了解梁氏與北洋故舊的聯繫與利益關係，則得從1920年梁氏初回國講起。

<sup>120</sup> 羅志田，〈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收入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88。

<sup>121</sup>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頁271。

<sup>122</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4年2月12日，頁649。

<sup>123</sup>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58-159。

<sup>124</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5年8月3日，頁677。



## 一、梁氏與北洋故舊的聯繫與實際利益

早在梁氏回國的消息傳入北京後，靳雲鵬便致電上海的梁氏，除了歡迎外，更表達出希望梁氏北來的希望。<sup>125</sup> 隔幾日的《申報》為靳氏如此的行動作出解釋：

安福部以選舉段祺瑞為副總統，認為收拾世局之上策，現已着手準備。……又靳雲鵬冀藉梁啟超氏之力，抑止安福之專橫，現正頻促梁氏來京，而東海方面為反對安福派起見，亦令梁啟超與梁士詒氏互相聯絡，以當安福派。現在二梁業經握手，依目前之形勢，直系、舊交通系、研究系三派將大同團結，以當皖系及安福派。此次梁啟超之來京，政局上恐有重大之影響，由是觀之，則安福三總長縱執極端反對靳氏之態度，而靳亦可安然無恙，仍任現職，蓋因有八省督軍以及二梁之後援也。<sup>126</sup>

對於北洋政治圈內各派系如此的勢力均衡盤算，梁氏卻不想參與其中，向女兒說道：「返津，……一切應酬皆謝絕，東海約宴亦謝之。」<sup>127</sup> 另外在1922年，黎元洪邀宴研究、政學、討論各系人馬之首領時，梁氏也列名其中，雖然梁氏並未赴宴，但從靳氏與黎氏之熱情態度可知，無論梁氏歸國後的打算如何，北洋政界同樣以過去「政治人物」為梁氏之角色定位，並試圖與梁氏作「合縱連橫」式的聯絡以牽制其他派系；此外，由於各方面積極爭取梁氏之合作，也可見得梁氏在政壇上仍然有相當的影響力。

梁氏自南京北返後，曾於1923年1月15日在北京《晨報》刊登一則養病謝客的啟事。<sup>128</sup> 但在隨後9月初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梁氏便參與了段祺瑞發起的「商議發起救濟日本賑會」，<sup>129</sup> 並介紹留日學生總會幹事王佐臣與何侃兩人見

<sup>125</sup> 〈各通信社電〉，《申報》，上海，1920年3月8日，版6。

<sup>126</sup> 〈閣潮最近情勢〉，《申報》，上海，1920年3月15日，版6。

<sup>127</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0年3月25日，頁581。

<sup>128</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3年1月15日，頁629。

<sup>129</sup> 參與人有在津要人梁啟超、鮑貴卿、靳雲鵬、曹銳、李思浩、潘復、姚震、屈映光、邊守靖、朱深、王印川等數十人。〈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3年9月8日，版4。

段祺瑞。<sup>130</sup> 此後，更擔任華僑急振會的理事，<sup>131</sup> 段祺瑞發起救同志會時，梁氏同樣名列其中。梁氏給女兒的信便說道：「我這幾天為救濟會事頗耽擱些正經功課」，<sup>132</sup> 可見梁氏著實花了不少時間與心力在其中。

除了在日本地震救濟相關活動上與政壇人物有所交集外，梁氏還與其有相當程度的接觸。1923年以前，梁氏雖不直接參加黎元洪宅中的政治聚會，卻也常與黎氏與熊希齡等人集議，為其捉刀代寫不少文章；<sup>133</sup> 對於在「金佛朗案」遭陷害被捕的羅文幹，梁氏也在感情激動下，主動為司法不公的部分寫信給黎元洪抗議；<sup>134</sup> 1921年，梁士詒出任國務總理時，也曾欲面晤梁氏請益；<sup>135</sup> 1922年，梁士詒派王正廷督辦魯案善後事宜，便是採納了梁啟超的主動建議。<sup>136</sup> 1923年9月15日，梁氏參加了李思浩的邀宴，會中與湯漪、林長民、蒲殿俊及楊永泰等交換政見；<sup>137</sup> 同年10月，梁氏又為了維持北京師範大學之經營奔走出力，說服范源濂就職校長，<sup>138</sup> 並實際參與范氏之邀，討論成立董事會以維持該校。<sup>139</sup> 雖說梁氏並沒有參與直接的政壇活動，但從以上來往可知，事實上梁氏仍與官場人物有實際的往來共事。梁氏之學生楊鴻烈便回憶梁氏：

到了星期六所謂「周末」和禮拜天便回北海快雪堂接見賓客，並與當時所謂財政金融「巨頭」如王克敏等大官僚搓小麻將，以尋樂消遣。實際上梁氏與北洋軍閥如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等都有關係，並非是一個

<sup>130</sup> 〈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3年9月10日，版3、4。

<sup>131</sup> 華僑急振會由熊希齡與江庸等人組織；救同志會與會者有靳雲鵬、曹銳、姚震、李思浩、潘復、丁世源、傅良佐、曹汝霖及陸宗輿等人。〈京津救濟日災彙要〉，《申報》，上海，1923年9月10日，版6。

<sup>132</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3年9月6日，頁645。

<sup>133</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1年8月間，頁600。

<sup>134</sup> 〈梁任公為羅案致黎黃陂電〉，《申報》，上海，1922年11月23日，版13；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625。

<sup>135</sup> 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4冊，1921年12月24日，頁1507。

<sup>136</sup> 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第4冊，1922年3月3日，頁1512-1513。

<sup>137</sup> 〈國內專電二〉，《申報》，上海，1923年9月16日，版6。

<sup>138</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9年5月1日，頁645-646。

<sup>139</sup> 〈北京師範大學迎范近訊〉，《申報》，上海，1923年12月6日，版6。

純粹的書呆子。<sup>140</sup>

其實梁氏之所以不能夠如其所願切斷與官場之關係，除了以上的往來外，主要還是由於梁氏在官場人物心目中，仍是一位值得考慮的人選。除了前文靳氏與黃氏分別在1920年及1922年的聯絡外，早在1920年3月補提閣員時，就有人力薦梁啟超擔任外交總長；<sup>141</sup> 同月，北洋政府擬組織學術院時，又將以梁氏為總裁；<sup>142</sup> 4月，勸業會總裁一職也傳出由梁氏接任的風聲；<sup>143</sup> 1921年3月，又傳出由梁氏繼任教育總長之說；<sup>144</sup> 1922年5月，發表新內閣閣員時，又由徐佛蘇詢問梁啟超擔任教育總長之意願。<sup>145</sup> 1924年11月，段祺瑞重新執政時，擬聘梁氏為高等顧問，<sup>146</sup> 遭到梁氏之堅拒；<sup>147</sup> 而後段氏召開善後會議也邀請梁氏參加，但同樣遭到拒絕。<sup>148</sup>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原外交總長沈瑞麟態度消極，段祺瑞政府開始思考接替人選時，也有人推薦對滬案頗有研究的梁啟超登臺；<sup>149</sup> 同時段政府成立外交委員會時，也將梁氏列為會員，但同樣遭到梁氏之拒絕。<sup>150</sup> 最後，梁氏唯一接下的職位是培養司法人才的司法儲才館，梁氏說道：

我入京前一禮拜，亮疇和羅均任幾次來信來電話，催我入京。我到京一下車，他們兩個便跑來南長街，不由分說，責以大義，要我立刻允諾。這件事關係如此重大，全國人渴望已非一日，我還有什麼話可以推辭，當下便答應了。<sup>151</sup>

<sup>140</sup> 楊鴻烈，〈回憶梁啟超先生〉（原刊於《廣東文史資料》，第8輯，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3年），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37。

<sup>141</sup> 〈各通信社電二〉，《申報》，上海，1920年3月25日，版6。

<sup>142</sup> 〈專電〉，《申報》，上海，1920年3月29日，版3。

<sup>143</sup> 〈各通信社電〉，《申報》，上海，1920年4月25日，版6。

<sup>144</sup> 〈專電〉，《申報》，上海，1921年3月19日，版6。

<sup>145</sup> 〈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2年5月23日，版3、4。

<sup>146</sup> 〈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4年11月28日，版3、4。

<sup>147</sup> 〈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5年1月1日，版7。

<sup>148</sup> 〈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5年1月11日，版4。

<sup>149</sup> 隨波，〈滬案起後之外交總長〉，《申報》，上海，1925年6月20日，版6。

<sup>150</sup> 〈二十四日執政府之特別會議·外交委員會條例公布〉，《申報》，上海，1925年6月29日，版6。

<sup>151</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9月14日，頁701。

時任教育總長的王寵惠與司法總長的羅文幹親自拜託梁氏，足見梁氏在北洋政府心中的地位。

至於更為實際的接觸，梁氏與北洋故舊還有更深一層的利益關係。彬彬回憶道：「後段閣倒，梁亦去位。政府仍月奉以三千元，謂之著書費，自是梁氏生計已裕，乃專意著作……」，<sup>152</sup> 可見梁氏與北洋政府有金錢上的贊助關係。1920年代的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普遍都有教育經費短絀的現象。因為政府發不出教職員的薪水，因此有要求發薪的「薪潮」。就北京政府來說，由1917-1927年，軍用浩繁，政失常軌，國家預算入不敷出。<sup>153</sup> 北京政府儘管在這樣經費短絀的情況之下，特別是段祺瑞重新執政後，仍給予梁氏每月 8 百元的夫馬費。<sup>154</sup> 梁氏得此金源，得以購買北戴河章宗祥要價 1 萬元的房子，<sup>155</sup> 而其喪妻之喪葬費用花上超過 3 千元，也是全由執政府的夫馬費支付還有餘。<sup>156</sup> 此外，梁容若曾回憶梁氏與北洋政府的經濟往來道：

至於他的經常生活，民元回國，袁世凱當權，是月送三千元，民五黎元洪復位總統，七月起月贈津貼二千元，民國十三年十一月段祺瑞就臨時執政後，月送夫馬費八百元。他在清華研究院任教授的時候，薪水是每月四百元，執政府的補助費兩倍這個數目。<sup>157</sup>

段執政府甚至是兩倍於教授薪水的補貼，完全可以看出北洋政府歷任執政對梁氏的特別照顧。<sup>158</sup>

除了北洋政府給予的金援外，梁氏也主動向北洋政府要求幫助。如1922年梁氏欲返粵處理營葬之事，仍向徐佛蘇要求派給一個調查的名義，撥給旅

<sup>152</sup> 彬彬（徐彬），〈梁啟超〉，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14。

<sup>153</sup>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188-189。

<sup>154</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5年8月3日，頁676。

<sup>155</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5年8月3日，頁677。

<sup>156</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5年9月20日，頁681。

<sup>157</sup> 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記〉（原刊於《新生報》，1960年3月11、18日），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87-288。

<sup>158</sup> 當然梁氏本身的出版品、數個職位的收入，以及擅長理財的頭腦皆是其經濟優渥的原因，但若少了北洋政府的支持，梁氏不但沒有若干政府職位的收入，更不會有閒錢可供投資。

費；<sup>159</sup> 1926年9月又想要藉著加拿大開萬國教育大會的機會，借這個名目籌旅費前去探望孩子與孫子。<sup>160</sup> 除了求財外，梁氏也時常向官場故舊為親戚安排職位，如1926年梁氏為梁廷燦代求一拿錢不做事的位置；<sup>161</sup> 同年9月4日，與孩子的信中提到「張孝若丁憂，已辭職，我三日前寫一封信給蔡廷幹，講升任事，能成與否，入京便知分曉。」<sup>162</sup> 顯然是為女婿周希哲請託。此後，對於女兒與女婿任職的地點，梁氏也很自信地提到：「現在少川又回外部，本來智利事可以說話，但我也打算慢點再說（因為我根本不甚願意你們遠調），好在外交總長總離不了這幾個，隨時可以說話的。」<sup>163</sup> 1927年，為了替女兒、女婿生計著想，打算「試和少川切實談一回，但恐沒有什麼辦法，因為使領經費據我看是絕望的，除非是調一個有收入的缺。」<sup>164</sup> 此後，又更直接的向顧維鈞索薪，要求顧氏匯錢給女兒、女婿，還不斷地加信催促匯款1,500元美元接濟。<sup>165</sup>

此外，梁氏任職於司法儲才館與北京圖書館，除了個人理念的發揮外，同樣也藉由這樣的位置將利益分配給家人。1926年選擇司法儲才館的職員時，梁氏自言：「一面為事擇人，一面為人擇事，你十五舅和曼儀都用為祕書，……乃至你姑丈（六十元津貼）及黑二爺（二十五元）都點綴到了。」<sup>166</sup> 1927年當北京官員陷入生計危機時，也因為梁氏擔任的幾件事，使窮親戚朋友們稍為得點綴。<sup>167</sup> 朋友天天餓飯時，梁氏向孩子們說道：「你二叔在儲才館當很重要的職務，不過百二十元（一天忙得要命），鼎甫在圖書館不過百元，十五舅八十元（算是領乾糧不辦事）……」，<sup>168</sup> 而梁氏提到的十五舅的差事，不僅可以不到儲才館上班，還能夠隔天或每天來打幾圈排。<sup>169</sup> 最後當梁氏考慮放棄儲才館之

<sup>159</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2年10月20日，頁622。

<sup>160</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9月17日，頁703。

<sup>161</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7月20日，頁698。

<sup>162</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9月4日，頁700。

<sup>163</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9月17日，頁703。

<sup>164</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7年1月2日，頁714。

<sup>165</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7年4月2日，頁724。

<sup>166</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9月14日，頁702。

<sup>167</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7年1月2日，頁714。

<sup>168</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7年3月10日，頁722。

<sup>169</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7年6月15日，頁739。

事業時，也是擔心「我這樣將身子一抖，自己倒沒有什麼（不過每月少去千把幾百塊錢收入），卻苦了多少親戚朋友們了。」<sup>170</sup> 可見連親朋好友均分享到梁氏從北洋政府得到的實際利益。而其中正透露出，無論1920年代北方政局如何此起彼落，梁氏與北洋政府之關係仍是相當密切，也是政府方面急欲籠絡的對象。

## 二、梁氏與北大校長一職

根據前文已經了解到梁氏與北洋官場的密切關係與實際利益接觸，接著從梁啟超與北大校長一職的關係，展現雙方最為交集的一面。

1920年代，全國各校均爆發了「校長風潮」，各地皆有學生要求「易長」的學潮發生。<sup>171</sup> 在此風潮之下，梁啟超其實頗受學生們的愛戴，早在1922年12月，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生反對王家駒擔任校長時，便希望梁啟超能夠前來長校，<sup>172</sup> 1923年教育部派劉彥擔任校長時，一部分學生仍堅持反對，欲自選梁啟超為校長，<sup>173</sup> 而該校學生各班又自行舉辦選舉，也以梁啟超得票最多。<sup>174</sup> 可見梁氏雖與北洋官場有較為密切的關係，也能得到學生的愛戴。

1925年9月20日，梁氏提到：

日來許多「校長問題」，糾纏到我身上，亦致忙之一。師大不必論，教職員、學生、教育部三方面合起來打我的主意。北大與教部宣戰，教部又欲以我易蔡，東南大學則教部、蘇省長、校中教員、學生，此數日又迭相強迫。北大問題最易擺脫，不過一提罷了。現在師大、東大尚未肯放手。我惟以極誠懇之辭堅謝之，然即此亦廢我時間不少也。<sup>175</sup>

在學生發動學潮，教授發動索薪運動的風潮下，<sup>176</sup> 1925年8月30日段祺瑞政府

<sup>170</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7年7月3日，頁740。

<sup>171</sup>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74-104。

<sup>172</sup> 〈北京通信·都門教育界可謂多事矣〉，《申報》，上海，1922年12月9日，版6。

<sup>173</sup> 〈教育部處置法專風潮〉，《申報》，上海，1923年1月8日，版6。

<sup>174</sup> 〈北京法專風潮不易解決〉，《申報》，上海，1923年1月9日，版6。

<sup>175</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5年9月20日，頁682。

<sup>176</sup>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188-189。

通過「整頓學風」之命令，<sup>177</sup> 由於梁氏在教職員與學生間的好評，北洋政府若想掌控各大學校，梁啟超便成為最佳人選。

以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北京大學為例，早在1923年初，北洋政府便曾致書章炳麟，準備請章氏出任北大校長取代蔡元培。<sup>178</sup> 而其實1924年也已傳出梁氏出長北大的消息，為此北大代表馬敘倫還特地出來闢謠。<sup>179</sup> 此消息的真實性無從得知，但1926年6月29日梁氏寫給時任北洋政府杜錫珪內閣教育總長的任可澄的信中說道：

改組京師大學事，其前提須先問校長人選之有無，質言之，則此問題與僕個人之出處有密切關係。若合併改組後而無主持之人，則精神無所寄，不如其已也。僕之出既為多數同志所不欲，自不宜孟浪；然於僕外別求一人，恐踏破鐵鞋終無覓處。……無已，或不用校長制，而設一中央高等教育委員會之類，而以委員長總攬改組進行事宜，亦未使不可，然於治事之敏捷，已遜一籌矣。且此委員長計亦非僕自任不可，然則僕仍投漩渦中，持名義上多有數人分擔責任耳。……茲事請公與石青細思，且熟察四周情形，博徵同人意見。但使人的問題略決定，則關於制度方面僕自當更為草一較詳密之計畫也。<sup>180</sup>

從此信來看，北洋政府欲對北京大學下手，而以梁啟超為主持人的計畫實非空穴來風。此外，有別於前文提及對若干內閣職位堅持拒絕的態度，梁氏對於北大校長一職誠有相當的興趣，甚至還獻策以「委員制」掛羊頭賣狗肉，以名義上之多人分權而實際上由梁氏總攬的方式進行改組，並且承諾日後將會有關於制度方面更詳密的規劃。隨後7月18日，又致函任可澄說道：

連上數書，未得復，想甚忙耶？季常瀕行來書，屬我勿作無謂之熱心，所論亦含片面真理，日來於茲事大不復置念矣。然公今茲既一出，即不

<sup>177</sup> 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75。

<sup>178</sup> 章念馳，《滬上春秋——章太炎與上海》（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102。

<sup>179</sup> 捷，〈京八校代表招待新聞記者請對庚 為公正之援助·新聞記者之答詞〉，《申報》，上海，1924年8月24日，版12。

<sup>180</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6月29日，頁696。

能不做一二事，以求自異於流俗。比者計畫規模若何，終願聞之也。<sup>181</sup>

從連上數書追問該計畫的規模與進行，十分清楚地顯示梁氏的積極態度。《申報》於1927年2月6日的報導中說道：「且任可澄雖以教育費問題，日為教育界所窘，而梁啟超長北大之計畫，聞暗中甚為活躍，如布置就緒，春間即將出現。」<sup>182</sup> 可見梁氏作為北洋政府的代表，主持北大的計畫在當時確實也相當程度地進行。可惜的是，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掌握北京政府，直接取消北大，將北京各校合為京師大學，由劉哲任校長，<sup>183</sup> 因此無從得知梁氏計畫中的教育方針或是進一步的政治布局。此後，北伐軍勢如破竹的北上，終於1928年6月8日閻錫山進入北京後完成北伐，梁氏出任北大校長一事便永遠停留在計畫階段。雖然這次計畫胎死腹中，卻能從中了解梁氏與北洋官場的密切關係。

## 陸、結論

梁啟超在自北洋政府下野，歐遊返國後的1920年代，並不如後世學者所言失去政治熱情，從此致力於學術研究之中；更不是當時報刊所謂「下野未再問政，……並政論亦不發表矣。……梁氏已為政治圈外之人。」<sup>184</sup> 站在張朋園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挖掘梁氏於南方活動的實際情況，發現梁氏與江蘇省教育會、東南大學諸教授間的相處情形，並藉由梁氏與北洋故舊的實際來往說明梁氏無論在主觀上與客觀上，皆與「政治」處於「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中：梁氏不但主動赴南方與江蘇省教育會合作，並且對接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展現濃厚的興趣；也被牽連進江蘇省教育會與「學衡派——國民黨」間的權力鬥爭中。

1923年10月，清華大學學生王造時在梁氏「雙十節國慶演講」後的一篇感想，正可以從一個反面幫助我們了解在時人眼中，梁氏於1920年代的實際身影。

---

<sup>181</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1926年7月18日，頁697。

<sup>182</sup> 平，〈北京政況之斑〉，《申報》，上海，1927年2月6日，版9。

<sup>183</sup>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上冊，頁151。

<sup>184</sup> 〈社評：悼梁卓如先生〉，《大公報》，天津，1929年1月21日，版2。



王造時說道：

我們十二分崇拜學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時我們也十二分懷疑政談的梁任公先生；我們十二分歡迎梁任公先生講學問，同時我們也十二分畏懼梁任公先生談政治。<sup>185</sup>

王氏並呼籲梁氏不應該「為政治活動而講學」。<sup>186</sup> 從此可見，在學校進行的所謂「學術活動」中，梁氏的想望並不只是「學術」。

回到前文提到的國民黨褒揚令省去梁氏政治作為的例子，可以發現梁氏之所以僅以「學者」形象突出在1920年代的歷史中，可能又是與「政治」脫不了關係。其實早在梁氏逝世之初，蔡元培與蔣夢麟提案褒揚梁氏的理由便是「梁啟超生前對於中國之學術頗有貢獻」。<sup>187</sup> 可見當時蔡、蔣二氏是從學術成績為梁啟超請命，然而胡漢民卻從政治因素上，因梁氏反對國民黨、反對國民革命、加入段氏旗幟為由，認為其一生全是「反革命」故不能褒揚其學術貢獻。胡漢民給梁啟超扣上的「反革命」在當時是一項相當嚴重的罪名，<sup>188</sup> 由此，其政治生涯的

<sup>185</sup> 王造時，〈梁任公先生講學的態度與聽講的態度〉，《清華周刊》，第292期（1923年11月），頁6。

<sup>186</sup> 王造時，〈梁任公先生講學的態度與聽講的態度〉，頁8。

<sup>187</sup> 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政治會議一七二次會議速紀錄」，黨史館藏，檔號：00.1/114。轉引自黃克武，〈蔣介石與梁啟超〉，附錄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一七二次會議速紀錄，收入呂芳上編，《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年），頁137-138。黃氏在該文中以蔣介石與梁氏的思想接近解釋國民政府褒揚梁啟超之決定。除此之外，黃群與張蔭麟的建議可能也大有關係：黃群為梁啟超好友，據拾遺回憶，黃氏於民國30年底與蔣介石會面時，當面提出國民黨不褒揚梁氏的學術文章，足見其氣度之淺。蔣氏被鬧得面紅耳赤，其後4月間，國民政府突然頒布褒揚梁啟超明令。另外竺可楨在1943年1月23日的日記中，也提到政府之所以忽然褒揚梁氏，與張蔭麟的提議有關。詳參拾遺，《杜月笙外傳》（臺北：躍昇文化公司，1996年），頁53-54；竺可楨，〈記張蔭麟〉，收入陳潤成、李欣榮編，《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北京：清華大學，2009年），頁273。

<sup>188</sup> 1920年代開始，「革命」一詞逐漸神聖化、正義化與真理化，與「反革命」一詞成為善惡、聖魔、正義與非正義的兩極劃分。「反革命」被建構為最大之「惡」與最惡之「罪」，更成為籠統隨意攻擊政敵且相當致命的武器。詳參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收入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1年），頁85-122。此外，當1927年2月，胡適剛結束在英國大說國民黨好說之行，而正要回國時，顧頡剛也提醒胡適若繼續發

「失敗」變成了定案。儘管梁氏確實在學術上有相當的貢獻，<sup>189</sup> 但就連其「學者」形象的聳立也正是「政治」在發揮作用。

總而言之，梁氏雖然因時局的關係，以及其政治想望最終並「沒有發生」，遂使其「政治」的一面為其「學者」形象所掩蓋。然而就本文的研究發現，梁氏無論在主動與被動上，都不可能與政治無涉。中國讀書人與政治的密切聯繫並不可能完全切斷，正如羅志田在研究北伐時期的章炳麟時所言，後世研究者以「學人」的角色為章炳麟晚年的定位，忽略了這類並未退出歷史舞臺且頗活躍的思想大家本人的政治想望與自我定位。<sup>190</sup> 最後，梁氏的例子告訴我們，歷史上的空白及史料中沒有談的事，或許正是幫助我們更理解歷史的切入點。<sup>191</sup>

---

表政治主張，日後勢必會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可見這一罪名的恐怖。詳參羅志田，〈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收入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頁240。

<sup>189</sup> 梁氏1920年代學術研究的價值見仁見智，但據時人陳登原所言，《清代學術概論》寫畢，10餘日後，《申報》出書廣告已見。「從文稿到印刷，新聞紙外，殆未見可以比速。當時余在南京，花牌樓有商務分館，購此書者每鵠立以俟。人家書桌上，無此書殆不足以言學。」足見梁氏學術著作在當時的地位。詳參陳登原，〈無據談往錄·梁啟超〉（原刊於《萬象》，第3卷2期，2001年），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75。

<sup>190</sup> 羅志田認為，今日一些對章炳麟、梁啟超抱有同情態度的研究者，即常以自己的現代知識分子心態去解讀傳統士人，以為章、梁晚年多從事講學是已由政治活動中「覺悟」出來，但其實他們想要參政的傳統情節一直都在。詳參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收入氏著，《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頁281。

<sup>191</sup> 承蒙審查人提醒，其實在《梁啟超年譜長編》中很難看到梁氏與孫中山等人接觸，可能也是含有深意。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彙編

國史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 二、年鑑

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 三、文集、日記、回憶錄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中國文化大學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編纂委員會編，《張其昀先生紀念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

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拾遺，《杜月笙外傳》。臺北：躍昇文化公司，1996年。

柳詒徵著，柳定生、柳曾符編，《柳詒徵劬堂題跋》。臺北：華正書局，1996年。

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臺1版。

梁啟超著，張運生、王曉潔編校，《儒家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陳潤成、李欣榮編，《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北京：清華大學，2009年。

年。

錢基博著，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四、報紙

《大公報》，天津，1902-1937年。

《小說月報》，上海，1910-1931年。

《民國日報》，上海，1916-1932年。

《申報》，上海，1872-1949年。

#### 五、專書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

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1年。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吳其昌，《梁啟超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呂芳上編，《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年。

李茂民，《在激進與保守之間——梁啟超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李喜所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1984年。

沈衛威，《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蘇省教育會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北伐統一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長春：吉林出版公司，2007年。
-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
-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長春：吉林出版公司，2007年。
- 許紀霖，《黃炎培：方圓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
- 章念馳，《滬上春秋——章太炎與上海》。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
- 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1920年前後為中心》。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
- 程光燁編，《文人集團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
- 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終結》。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
- 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六、期刊論文

- 〈文錄：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續第十六期）〉，《學衡》，第18期（1923年）。
- 〈最近逝世之國學家〉，《良友》，第33期（1928年12期）。
- 王信凱，〈《學衡》中的「柳詒徵」〉，《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5期（2004年1月）。
- 王造時，〈梁任公先生講學的態度與聽講的態度〉，《清華周刊》，第292期（1923年11月）。

- 江 湄，〈從「士君子之學」到現代「人生哲學」——論五四後梁啟超對儒學史的重構及其思想意圖〉，《淡江中文學報》，第20期（2009年6月）。
- 柳詒徵，〈梁氏佛教史評〉，《學衡》，第2期（1922年）。
- 夏曉虹，〈作為政治家的梁啟超——「梁啟超」研究導論之一〉，《雲夢學刊》，第29卷第5期（2008年9月）。
-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合與排拒〉，《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1986年6月）。
- 陳以愛，〈「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東海大學歷史系、中正文教基金會合辦「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2007年12月15-17日。
- 彭明輝，〈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初始（1911-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9期（2008年5月）。
- 彭春凌，〈《歷史研究法》與1920年代的梁啟超〉，《雲夢學刊》，第29卷第5期（2008年9月）。
- 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6期（2002年5月）。
- 胡 適，〈老章又反叛了〉，《國語周刊》，第12期（1925年8月30日）。
- 鄭大華，〈論「東方文化派」〉，《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1993年）。
- “Historical New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4:3 (April 1929).

## 七、未出版學位論文

- 王信凱，〈柳詒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宜蘭：佛光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劉紀曜，〈梁啟超與儒家傳統〉。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85年。
- 劉惠璇，〈中華教育改進社與教育獨立運動（1921-192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86年。